

事，我们如何把它处理一下就过去了，就回到“常态”了。近期关于香港的事情大家也很关心，它不是偶尔爆发一个事我们马上处理一下又回归“常态”的问题，相反，它也体现着不确定性，包括危机和风险，这成了常态，而在这个常态下再看世界层面的社会变迁，那整个图像就变了。

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只是应该多走一步、多看两步，而是要不被原来的分析框架所束缚，这样来看待国际关系和国家本身；如果是从非国家的角度，比如说从全球的视野和角度来看国际关系，也会对国际关系本身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今天我们处理好多外交事务、国际事务也会有不同于狭义的国际关系的认识，不论是主导国家、霸权国家还是小国、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在国家范式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都不是简单地只用国际关系视角就能看清楚、讲清楚的。这样，就可以重新把世界政治的概念和范式引入国际问题的研究中来，至少可以增加一个认识全球性的人口流动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视角。

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

宋新宁*

自1952年一体化进程启动以来，欧洲的危机不断，欧洲一体化本身就是在危机中发展过来的，没有危机也就没有它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危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是个常态。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出现的危机显得更加明显，可以说是多重危机交织在一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所谓的多重危机？笔者认为，重点是要分析在这些危机中，哪些是制度性的，哪些是非制度性的，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带有暂时性、是可以解决的。

欧洲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一是最近十年来的债务危机，或者叫欧洲政府的债务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二是欧洲经济面临的增长疲软问题，最近十年来除个别年份，欧盟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不到2%，2019年主要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三是难民危机和移民问题，两者是连带在一起的；四是欧盟国

* 宋新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让·莫内终身教授。

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或极端主义问题，欧洲的极右翼和极左翼都有所增长，疑欧趋向有较大的发展；五是英国脱欧；六是欧盟成员国中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带有制度性的，即在欧洲是无法解决的。第一是欧洲政府债务问题。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问题是个老问题，是与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即福利国家，或社会资本主义。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造成了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居高不下。西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一般均超过GDP的20%，瑞典和丹麦达38%，法国占35%，改革后的希腊仍占21%，政府年度预算的50%以上是福利支出。因此，政府债务超过欧盟规定的上限，是各个国家的常态。与此相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出现偿债危机就不奇怪了。同时，在资本主义选举政治的条件下，减少福利和增加税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笔者在2011年就指出，欧债危机是被人为夸大了，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利用所谓的危机，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实际上，偿债危机本身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只是欧盟个别国家的问题，并不是整个欧洲联盟的危机，也不是欧元区的危机。在笔者看来，债务危机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欧洲的债务问题则是无解的，因为欧洲国家政府的债务问题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性造成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第二个制度性问题是移民问题。这也是欧洲国家的老问题，相关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欧洲国家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是劳动力过剩，各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不足，很多工作没人做，需要移民来补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所决定的。一是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其中意大利和德国最严重，意大利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2.4%，德国达21.1%。整个欧洲联盟，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0%以上，超过1亿人。老龄化造成了各国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必须依靠移民来解决。二是社会福利制度问题。欧洲的社会福利“太好”，造成本国劳动力没有再就业的动力；同时高福利对移民构成巨大的吸引力，使得欧洲成为“移民的天堂”。三是相对宽容的移民政策。在西欧和北欧一些国家，定期实行移民大赦，即给予非法移民合法身份，从而导致非法移民不断进入。难民问题与移民问题相关，理论上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欧洲国家担心的是难民转变为移民（合法与非法），以及恐怖分子以难民的身份进入欧洲。

至于其他的问题，是非制度的问题，即通过政策调整，是可以解决或缓解

的，有些是偶然的、暂时的。但是，欧洲的现实状况造成了一些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总之，对于欧洲出现的问题，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首先是要区分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其次，要区分问题和危机，不能笼统地讲危机；再次，要区分欧洲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哪些是单个成员国的问题，哪些是欧洲层面的问题；最后，欧洲所出现的问题，是和整个世界相关联的，要把欧洲的问题放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中的移民问题

江时学*

美国对拉丁美洲移民的政策，近几年已成为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

在历史上，南北美洲之间的人员往来是司空见惯的。19世纪，美国的领土扩张导致更多的拉美人进入美国。美国学者豪尔赫·多明戈斯（Jorge Domínguez）将这一现象称为美国人口的“拉美化”（hispanization）。拉美人向美国移民，显然受到了“拉力”和“推力”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为拉美人提供了改善生活的美好机遇。这是美国具有的巨大的“拉力”。相比之下，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失业和贫困随处可见，而且还长期受到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的困扰。这是促使拉美人背井离乡的“推力”。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外来移民，因此，近在咫尺的拉美显然能轻而易举地满足美国的这一需求。例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9年2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拉美移民对美国的经济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增加劳动力、减缓人口老龄化、提升企业家精神。该报告进而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拉美移民还将对美国的经济作出贡献。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拉美国家“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因此，拉美人必然会把美国视作最佳的移民目的地。在最近的几

* 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